

明末清初皖江作家群论略

章建文

提 要 在明末清初是皖江文化形成初期,皖江作家不仅有突出的创作实绩,而且在思想的整合中引导着文坛的风尚。由于名家诗文集在清初多遭禁毁等原因,致使今人不太清楚这一作家群体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学界虽然有一些对皖江诗文名家的个案研究,但是,对这一时期皖江作家群的整体、宏观研究至今尚未展开。本文拟就皖江群体之结构、创作情况、文学思想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做一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希望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关键词 明末清初 皖江 作家群

明末清初,皖江人文荟萃,出现了阮大铖、方以智、方文、钱澄之、沈寿民、梅朗中、施闰章、吴肃公、吴应箕、刘城等名家,在当时的文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但他们的诗文集多遭禁毁,阮大铖的《咏怀堂诗集》也因人品等原因未收入《四库全书》,清代的明诗选本也不屑录其诗作。虽然他们自己及亲朋不顾禁令想方设法刻印屡经禁毁与战火而留存的书稿,但传播的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无疑削弱了他们作品对后代的影响,致使今人对桐城派之前的皖江作家知之甚少。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学界对阮大铖、施闰章、方以智、方文、钱澄之、吴应箕等诗文名家的个案研究已展开,取得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成果。但是,对这一时期皖江作家群体的整体性研究至今尚未起步。鉴此,本文拟对明末清初皖江作家做一宏观的论述,介绍其群体结构、创作情况、文学思想和历史地位等方面的情况,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者对这一重要课题的重视。

一 明末清初皖江作家群的基本情况

就总体的情况看,明末清初皖江作家群以家族、联姻、师生(同门)和社团为纽带形成了三个较大的作家群体,即桐城、宣城和池州三大作家群,而皖江其他地区或比较零星与松散,如芜湖也出现了沈昆铜、萧云从等,但没有形成核心,比较松散。或因核心人物名气不大而影响较小,如泾县也出现了以万应隆为首的作家群,但被当时文坛忽略。

从作家群的规模来看,桐城作家群规模最大,名家众多,作家之间的关系也最复杂,有几个小作家群组成:(一)以方以智为核心的作家群,是在明末泽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成员有方以智、方文、孙临、周岐、吴道凝、钱澄之等,又联吴淞而成云龙社,有较大影

*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F07-08D45)成果之一。

响。(二)以阮大铖为核心的中江社作家群。中江社成立于 1632 年,主要成员有阮大铖、潘映鲁、方启曾、钱澄之、吴道凝、方文等。(三)清初以潘江以核心的作家群。除了一般的社集唱和之外,1676 年,潘江与陈焯、刘鸿都、赵襄国、张杰、左国治、孙中凤始举花会,花时则会,会辄有诗。后又有姚文勋、姚文燮、姚文焱等人先后加入,经十余年不辍。这一群体主要作家还有钱澄之、方文、方授、姚文然、张英、李雅、陈式、方孝标、方亨咸等。(四)清初,陈焯、胡栲峰、何道岑、张蔚乔、吴南苍、方孝标、方亨咸、姚文勋、姚文然、姚文焱等在南京结潜园十五子之会^①。(五)据《龙眠风雅》,这一时期桐城出现了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章有湘、姚凤仪、吴令则、吴令仪、左如芬、姚宛等女诗人,女性作家群已基本形成。

宣城风雅开启于宋初梅尧臣,有着深厚的诗歌文化积淀。明末宣城文坛再兴,出现了以沈寿民和梅朗中为核心的作家群,群体规模也较大,主要有麻三衡、沈寿国、吴垌、蔡蓁春、施闰章、吴肃公等人。清初前期以施闰章为核心,主要集中了高咏、梅磊、梅庚、梅清、沈泌、沈埏等人,他们相互唱和,形成了“宣城派”。后期以梅清为核心,1687 年始举花果之会,不拘时地,岁必数举,常二十余人相聚唱和,吴肃公、梅庚、沈泌、蔡瑶、施彦恪、汤逸等宣城名人均有参与。

贵池作家群的规模相对来说较小。在明末以吴应箕和刘城为核心,周围有李源常兄弟、吴应筵为首的“延陵七子”和刘廷奎等,到清初以刘城和吴应筵为核心,吴孟坚、王尔纲、郎遂等作家也加入进来。

从作家的生存形态来看,皖江作家的生存形态在当时文人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阮大铖天启中进士,天启四年因吏部给事中补缺一事与东林有隙,又因投机取巧与阉党有染。崇祯二年钦定逆案,名列其中,赎罪为民,遣返故里,过了十七年的诗酒逍遥的潜伏日子。在弘光朝任职后,对东林复社一脉进行打击报复,弘光朝灭时又降清。《明史》将其列入《奸臣传》。吴应箕为复社后期领袖,以教书与选文为生,主持南都清议。弘光朝灭亡后,在家乡举兵抗清,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沈寿民在明时被荐举入京,又因上疏杨嗣昌夺情而后罢归,不再参加科举,入清后不入城,清苦自守,是“海内三遗民”之一。方以智则从为官到抗清,再到削发为僧而成为一代名僧。方文虽有短暂的入幕,但一生大部分时间以行医、卖卜、游食漂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广交贰臣新贵,却也能握道自守,是比较典型的自我放逐和精神流浪的遗民。而姚文然、方拱乾等人入清后又仕新朝,施闰章、方孝标、姚文燮、张英等越来越多的青年士子入清后也相继入仕。也许是“道在何妨仕”,^②他们又相融在一起,又和而不同,成为皖江文化之特色。

从相互之间的联系来看,他们除了在复社活动中相互交流外,还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与皖江其他作家群体进行交往交流。1619 年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在福宁任上曾问学于池州建德郑三俊,方以智在旁也得长见识。郑三俊也是沈寿民的老师,他官至刑部尚书、太子少保,是有名的清官。任南户部尚书其间,复社中的皖江士子多依附在他的周围。另外还有几次小型的活动也值得关注:(一)1620 年,万应隆、吴应箕、沈寿民、沈士柱、梅朗中等十六人成立南社。(二)1631 年,方以智游宣城,与梅朗中、颜绍庭等人结交。从

^①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合肥:黄山书社 1990 年版,第 237 页。

^② 方文:《蠡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影印本,第 657 页。

1642—1650年间,方文四游宣城,与沈寿民、梅朗三、蔡蓁春、梅磊、梅清等宣城作家有广泛的接触、交流和唱和。(三)1639年正月,吴应箕等贵池作家与前来池州应台试的方以智、方文、周岐、吴道凝、赵相如、刘汉、钱澄之等十五人在试后诗酒唱和。这三个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当然不止于此,然而这些也足以说明他们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

二 明末清初皖江作家的诗文创作

就散文创作来说,皖江有吴应箕、刘城、方以智、钱澄之、沈寿民、吴垞、施闰章、吴肃公等名家。就诗歌创作来说,皖江有阮大铖、方以智、方文、钱澄之、潘江、刘城、吴应箕、沈寿民、梅朗中、施闰章等名家。这些作家的人生选择和生存状态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创作在内容上却表现出基本一致的主题取向。

(一) 国事民生的忧思

明末,由于政治失序,党争叠起,中下层文人依附于上层的清正大官,操控舆论,议论朝政,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朝廷决策。皖江诸子多依附在郑三俊、钱禧、范景文、黄道周等名臣的周围,针对国家大事和地方行政,写了大量的策、论、书、议,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方以智写下了《拟上求治书》、《请纓疏》、《钱钞议》等(见《浮山文集》),沈寿民也写下了《劾兵部尚书杨嗣昌疏》、《上南户部尚书郑公疏》等(见《姑山遗集》),刘城、钱澄之等人也都写了不少这类文章。但最突出的是吴应箕,他写下了《拟进策》、《兵事策》、《时务策》、《募立社仓议》等策、议之文,张自烈认为吴应箕“自诗歌、书、序、传记外,尤长于策论,策论自立一家,类足以整乱匡治”(《楼山堂集序》^①),皖江诸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于此可见一斑。

在明末清初的诗歌创作中,皖江诸子对朝政大事的担忧表现出他们善于从更高更大的视角来反映社会现实,虽然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思考的,但从另一个方面却也表现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吴应箕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他的《诵经行》就揭露了佛教“假托往往藏奸匿,受戒尝为聚众资”的实质,暴露其虚妄与危害。《何以》对“不见十年来,请兵日不绝。兵多贼亦多,不见一贼灭”时局,发出了“虽我怀区区,天远何能说”的忧虑。《宁南檄》则可看出吴应箕对左良玉东下对弘光朝造成威胁的忧虑,这在当时可说是富有远见的。刘城也以《天启宫词》、《崇祯宫词》组诗的形式状叙了时代的变迁以及自己的思考。然而他们更多的诗作是抒发黎元之忧,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在战事频仍、灾害频发、贪官横行、盗匪四起的乱世中老百姓的苦状。如吴应箕《大旱歌》、《食土行》、《耕田苦》等,钱澄之《获稻词》、《漕卒行》、《捕匠行》、《田家苦》等,而方文的诗中不仅有自己“莫笑西川杜工部,也从人乞草堂资”^②的心酸和《无酒》、《无米》、《无油》、《无盐》、《无炭》、《无薪》^③的困苦,还有《太湖避兵》、《大水叹》、《捉船行》、《谷贱》等诗篇反映一般民生疾苦,以其长于叙事之笔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百姓生活史。

(二) 忠孝节义的宣扬

宣扬忠孝节义是明末清初文学的重要主题。皖江作家一方面用散文的形式为忠义之

① 吴应箕:《楼山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8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下栏。

② 方文:《蠡山集》,第418页。

③ 方文:《蠡山集》,第251—253页。

士立传、作墓志铭与祭文等,来状叙英烈的事迹,以弘扬忠义,告慰死者,继承遗志。吴应箕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高攀龙等熏朝忠节立传,“彰往而著后”。刘城的《晦桐文集》、钱澄之的《田间文集》、沈寿民的《姑山遗集》、吴肃公的《街南文集》等文集中也有大量的传记、墓志铭、祭文。如果说这些在明末清初的文坛是一种常态,那么皖江作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名节则提升到攸关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强调,“留东汉之再世者,气节也;魏晋贱守节而汉亡。留南宋之一隅者,理学也;韩侂胄禁伪学而宋亡。且自古至今,上无直节之臣,则下必有怀忠之士,故季世之风声议论,即盛世之法度纲纪,其有关系一也。”^①一是吴肃公的《阐义》集中而大规模地弘扬“义”之精神,在文学史上却比较少见。《阐义》分义民、义客、义属、义弟子、义童、义工、义卒、义道士、义僧、义女、义庵、义隶、义仆、义婢、义丐、义屠、义盗、义优、义娼、义兽、义禽、义虫鱼 22 卷,每卷都有序,每篇序后沈寿民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另一方面则以诗歌来抒发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无悔无惧的忠义精神的颂扬和作为遗民的故国之思。吴应箕有《和周仲驭十四哀》、《悲苕溪》、《悲东莞》、《闻陈青溪殉难》等名篇,刘城有《五人墓之歌》、《断头歌》、《哭史公六首》、《哭黄先生六首》、《哭戴敬夫六首》、《哭麻孟璇》、《始闻孙武公讣哭之》等,钱澄之《藏山阁诗存》就收有《哀江南》(19 首)、《南京六君咏》(6 首)、《续哀》(8 首)、《广哀》(11 首)等,讴歌抗清志士的忠义精神。施闰章诗文集也有大量颂扬孝子烈妇的诗文。方文在 1644 年明亡时即写下《宋遗民》表明自己的遗民之志,而且在每年崇禎忌日都作诗表达自己的故国之思。尽管“年年此日有诗篇,篇什虽多不敢传”^②,但《蠡山集》中还是收录了 8 首。

(三) 亲朋之间的酬答

皖江作家多交游广泛,重情谊,写下大量应酬唱答之诗文。这类诗文虽然量大,但艺术成就总体不高。在这些酬唱中,或社集唱和,或劝勉亲朋,或讨论问题,或商请事务,或思念亲友,或相互赠答,或送别贺寿,虽然有客套应酬的成分,但也有真情之流露。在散文中这类题材主要用书、序两种体裁来表现,这两类体裁在作家的文集中都占有相当的份量。如沈寿民《姑山遗集》收文 27 卷,而“书”“序”就有 15 卷之多,还有“尺牋”4 卷,这 19 卷大多是入清后交游的产物。可见他虽深隐不入城,但不仅没有与外界断绝往来,而且还有着较为密切的交流。在诗歌中,这类题材在他们的诗集中也占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社集唱和切磋诗艺之作。

(四) 山水田园的赏玩

明秀的皖江山水,培育了皖江作家热爱山水的情怀。当他们忧郁不得志之时,往往沉静于山水田园之中,释放壮志不酬的戾气,化解心中的郁闷。方以智、刘城、钱澄之等人都写了不少游记,吴应箕的《楼山堂集》中收入的游记虽然较少,但他的《相公墩记》、《南岳看月记》可谓是当时小品游记的佳作。方文《蠡山集》中《北游草》、《徐杭游草》、《鲁游草》、《西江游草》多写景记游之诗。钱澄之被称为田园诗人,韩荃说“读先生之诗,冲淡深粹,出於自然,度王、孟而及陶矣。”^③而他与王、孟、陶不同的是,国破家亡、九死一生之

①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 15《答沈眉生书》,第 543 页下栏。

② 方文:《蠡山集》,第 1078 页。

③ 钱澄之:《田间文集》,合肥:黄山书社 1998 年版,(序)第 2 页。

后,为了生计,为了立言的需要而耕作于田间的,他是从立言之余来体味田园生活的简单、朴素和真实自然的,或者说是从立言之余从田间劳动来体味王、孟、陶诗中的淡然悠然,以消除身体的劳累,使自己的心灵得以超脱。施闰章的山水诗是他的诗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得到了当时与后代名家的褒扬与推崇。如王士禛的摘句图摘的都是他山水诗中的佳句:“予读施愚山侍读五言诗,爱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如园客独茧。约略举之,若‘别绪不可理’、‘洒尽暮江头’、‘人日日初晴’、‘朔风一夜至’、‘明月无远近’、‘倚枕不能寐’数篇是也。”^①。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诗集中有大量以山、水、地名为诗题的诗,如方文所说“莫道闲吟是偶尔,他年邑乘垂千秋”^②,有借可能载入地方志来使自己的诗名垂千古之意。

三 明末清初皖江作家的文学思想

吴应箕、方以智、钱澄之、施闰章等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主当时之坛坫,而且还以自己的文学主张引导着当时的创作。他们文学主张的趋同,更加有力和有效地整合了当时的皖江文坛。

(一) 主用

经世致用是皖江文坛主流思想和普遍追求,他们认为文学有两个层面的功能,一个层面是有用于自己,一个层面是有用于社会。

明末清初,社团活动频繁,文学作为交际功能凸显,确有“文辞瑰异人争识”^③的效果。吴应箕也说:“吾党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谊也;所讲求者,异日之风烈事功;所借以通声气者,此文艺也;而假以宣彼吾之怀者,此觴聚也。”^④这实际是基于“文者,生乎心者也”^⑤的观念出发,以“文”来观人的现实需要。

当然文学创作不仅是迎合交际应酬,而是文人不能“立德”“立功”之后“立言”的需要。然而皖江作家立言以传世是与文学有益于社会结合起来的。不管是“诗也,通于政矣”,^⑥还是“风以诗书六艺,使相切磨以兴教化者,表帅一方者之责也。礼失而求诸野,道失而求诸文,其亦庶几可也”,^⑦都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教化,并以此为标准来从事文学批评。吴应箕说:“今论诗者谓诗宜从三百篇就其源,抑知三百之诗有一不宣助教化、按切风俗者乎?言无资劝惩,夫子固删之矣。”^⑧钱澄之也说:“要令适于世用,非徒以资空谈也……务在疏明经义,论断古今,斟酌时宜,实可见诸行事者,而一切枝词浮藻概黜不

① 王士禛:《池北偶谈》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3页。

② 方文:《蠡山集》,第793页。

③ 方文:《蠡山集》,第1046页。

④ 吴应箕:《楼山堂集》,第558页下栏。

⑤ 吴应箕:《楼山堂遗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3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下栏。

⑥ 沈寿民:《姑山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上栏。

⑦ 施闰章:《施愚山集》(四),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97—98页。

⑧ 吴应箕:《楼山堂遗文》,第40页上栏。

用。”^①吴应箕甚至说“助流政化者,诗也,苟无关系,不作亦可。”^②

(二)重学

“学”是明理致用之需要。方以智认为“学”是一种手段或工具,目的是明其理,通其故,以志道游艺。他说:“士以读书明理为业,犹农工之刀耜也。志道游艺,外内一致,张弛鼓舞,全以此养之而化之。”(《读书类略提语》^③)而钱澄之则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学”的作用:一是从“学”与主体素质提高的阶段性的来说的,认为提高“才”、“识”有时间的先后,也有层次的高低。“夫人学与年进:四十以前,与进者才也;四十以后,与进者识也。至于识进,则才亦渐敛矣,非才之不如前也,前此才之所为,至于是而始觉有不足为也”。^④二是从“学”与“情”的关系来说的,“学”不仅有利于培养情感,还有利于准确地表达情感。“诗之为道,本诸性情,非学问之事也。然非博学深思,穷理达变者,不可以语诗。当其意之所至,而蓄积不富,则词不足以给意;见解未彻,则语不能以入情。”^⑤三是从“学”与“用”的关系来说的,学问是文学来致用之必须。“言其所学,为有本之言,言之有用者也;彼未尝学而为其言,皆剿袭以取世资,言之无用者也:相去远矣。”^⑥施闰章则不仅认为“诗之用宏而原远如此,非不学无术之所能为也”^⑦,而且在“学”有利于“文”的创造性方面予以强调:“诗之工者,作者或不自知,有非学所能至,而非空疏不学者所能倖也。夫诗之为道大矣,惟雄才大力、博物阅览之人,然后能振奋自拔于侪俗中。”^⑧

至于“学什么”和“如何学”的问题,皖江作家基本上走的是“尊经重史,以儒家为根基,采纳百家”路子:“昔人谓胸中先有六经、《语》、《孟》,然后读前史。史既治,则读诸子,是古人治心积学之方。”(《文章薪火》^⑨)按先经后史再诸子的顺序学习。张英又说“吾闻先正训子弟读书法,以六经为根源,以诸史为津梁,以先秦两汉之文为堂奥,以八家为门户,崇尚实学,周通博达,能不为制举业所缚束,涵濡既久,能振笔为古文词者代有传人。”(《龙眠古文初集序》^⑩)“学”的内容和路径则更为具体。

(三)尊情

从李梦阳倡“真诗在民间”之后,尊情之声就不绝于耳,皖江作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吾谓诗本性情,无情不可以为诗”^⑪,“文者,生乎心者也”。然而又如何克服重情之真弊病呢?钱澄之说:“情之多者,不闲之以正,则或失诸邪;不用之于专,则或流诸滥;无邪无滥,而后谓之性情,而后可以言诗。”^⑫控制“情”的“邪”与“滥”,有“正”与“专”两种

①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98页。

② 吴应箕:《楼山堂遗文》,第41页上栏。

③ 方以智:《通雅》,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35页。

④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302页。

⑤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256页。

⑥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98页。

⑦ 施闰章:《施愚山集》(一),第19页。

⑧ 施闰章:《施愚山集》(一),第84页。

⑨ 方以智:《通雅》,第56页。

⑩ 张英:《笥素堂文集》卷4,《张文端公全书》,光绪二十三年桐城张氏重刊本。

⑪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244页。

⑫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297页。

方法,这实际上是强调“情”必须符合儒家之道德,并将之内化为自我修养而坚守之。他又说“夫天下未有离情以为道者。非道之情,妄情也。非情之道,伪道也。文也者,载道之器,即达情之言也……盖未有非道而可言情,无情而可为诗文者也。”^①反对无感情的说教,将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融合。吴应箕在这方面有较多的论述,我在《吴应箕研究》^②中已作分析,此不赘述。

(四)尚朴

吴应箕、方以智、方文、钱澄之、宣城派等都以“朴”为美,形成了皖江作家创作的基本倾向,长期的创作实践又使之成为了他们自觉的理论追求。

予乃尝取所为空灵俊秀者之诗,而读之而读之如捕风捉影,无一根柢于诗人之有所假托。含蓄其言,淡而远,质而真,沉顿而有感叹者,概未有得……夫诗贵远、贵真、贵有感叹,然非原本深而用物精者,先不能为淡、为质、为沉顿,故天下实能见性情之诗者,必非未尝学问者,世安得有诗哉……夫彭子则亦非不能为空灵俊秀也,名其诗草曰《存朴》,此犹予所谓淡而远,质而真,沉顿而有感叹之说也……吾见世之能存诗者莫若朴也。(吴应箕《存朴斋诗序》^③)

其始作也,宁生无熟,宁险无平,戛戛乎陈言之务去。烹炼既极,渐近自然,似不知胸中有所为古文奇字也,而字必有据,语必有本,即先生亦不自知其然,则博雅之效也。(钱澄之《文灯岩诗集序》^④)

刘城与方以智虽倡导“朴”,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阐述,而吴应箕不仅对“朴”进行了全面而集中的阐述,而且将“朴”上升为最高的审美理想,钱澄之、施闰章等人对“朴”的论述则进一步丰富了“朴”的内涵。具体表现为:(一)“朴”是以“学”来融化表现对象,体现出作家对事物本质准确把握的理性观照和对语言熟练驾驭所呈现出的从容与自信,不需要通过外在形式的修饰也能达到传世的目的。(二)“朴”将“质”、“真”、“淡”、“远”等从不同的维度纳入于自身,丰富了“朴”的内涵。“质而真”是就情、事、理而言的,它是“朴”的逻辑起点;“沉顿而感叹”是就情感的酝酿和表现而言的,它是“朴”的主要表现手法;“淡而远”是就审美效果而言的,它是“朴”所呈现的浑厚的状态。从三个维度构建起的开放式的“朴”的理论框架,在“朴”这一范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朴”不再是“得之于自然”的审美形态,而是“烹炼既极,渐近自然”,是一种“深造”而致的“自然”,是一种经过创造和锤炼所呈现出的不露痕迹的“自然”。将博学、深思与苦吟结合起来以达致“朴”的深与厚,与公安派有很大的不同,与竟陵派相比也更为具体。(四)“朴”不仅体现为一种“老熟”的浑融,也体现为一种纯驳互见的本色。钱澄之说“予尝谓,古今之人品诗文不定一格,大抵以本色为佳。夫本色,固不妨于纯驳互见。驳者,其人之病也,凡古今人品诗文之称绝者,未有无病者也。以龙门氏之为史,而不免于疏;以少陵氏之为诗,而不免于拙:两公之本色在此,后之所以传两公者即以此……吾宁任吾本色而病,必

①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275页。

② 章建文:《吴应箕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80页。

③ 吴应箕:《楼山堂遗文》,第36页上栏。

④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256—257页。

不为无病而乡愿也。”^①显然,他是在强调作家要保持自己本真本然的部分,不要“乡愿”式的“朴”。

四 明末清初皖江作家群的历史地位

首先,从创作实绩看,皖江名家众多,成绩斐然。这可以从当时与后世名人的评论中见出端倪。下面试举几例以作说明:

阮大铖:“大铖五言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律诗散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推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章太炎《咏怀堂诗封面题辞》^②)

方以智:“方以智……早年以文章誉望动天下。”(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五^③)

方文:“桐城方尔止,能诗称国手。贻我《蠡山诗》,声价重琼玖。”(钱谦益《读方尔止蠡山诗稿却寄二十韵》^④)

沈寿民:“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评许在盛名之上,人骇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选时文,耕岩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轻置于文待。一时声名之盛,吴中二张与江上二沈相配,二张谓天如、受先,二沈谓昆铜、耕岩,不以名位相甲乙也。”(黄宗羲《征君耕岩先生墓志铭》^⑤)

施闰章:“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王士禛《池北偶谈》^⑥)

吴肃公:“宁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宣城吴肃公晴岩《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王士禛《魏禧吴晴岩》^⑦)

其次,从作家所具有的身份看,吴应箕、施闰章和张英三人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不仅为皖江文学走向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当时的文坛风尚,或者促成某种文学风尚的形成。吴应箕主持复社选政。复社选文称《国表》,共有五集,而《国表》一、二集为吴应箕与复社诸子共同选编,三至五集为吴应箕一人选编。黄宗羲说:“复社《国表四集》为其所选,故声价愈高。尝于西湖舟中,赞房书罗炯之文,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其为人所重如此。”^⑧不仅士子将其科牒“奉之为珪璧指南”,那些入选者也引之为荣,“贵于凌高梯而被丹黻”(陈肇曾《吴楼山先生遗集序》^⑨)。施闰章任山东提学道僉事五年对山东乡试的考风考纪作了大量的工作,淳化了山东的考风与文风,所以方文说:“吾友愚山子,往岁官山东。词场擅风雅,六艺能兼通。以此训多

① 钱澄之:《田间文集》,第261页。

② 章太炎:《咏怀堂诗封面题辞》,见胡金望、汪长林点校:《咏怀堂诗集》,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529页。

③ 王夫之、钱澄之:《永历实录 所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④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42页。

⑤ 黄宗羲:《黄宗羲文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⑥ 王士禛:《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⑦ 王士禛:《分甘余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页。

⑧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

⑨ 吴应箕:《楼山堂遗文》,第2页上栏。

士,丰兴鄆鲁风。”^①1681年他典试河南时,又制定《豫闾公约》^②,规范了时文创作,无疑对古文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英1677年入直南书房,深得康熙信任,赐居禁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一时制诰,多出其手。由此皖江学风与文风渗进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层面,对清代的文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桐城派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话语环境和接受环境。

再次,从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看,皖江散文思想从前期的师尊秦汉派到崇祯年间转向推重唐宋派,强调本之经术、发自内心的,和清初侯方域、黄宗羲与易堂诸子相呼应,对清初师尊唐宋的文学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桐城文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理论指导。而在诗歌思想上,钱澄之强调气韵,追求冲淡,施闰章所追求的清远朴厚,因施闰章、方文与王士禛交往密切,我们似乎可以说皖江诗歌的创作实绩和理论主张对王士禛的神韵诗派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后,从对后世的影响看,刘声木评钱澄之说:“论诗文精妙,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至当而不可易,洵后世学人之龟鉴。”^③如果说钱澄之在艺术经验和文学思想方面为桐城派提供了种子或方向,那么吴应箕的诗文中所流露的忠君爱国思想则为后人在乱世之际提供了思想的火种和行动的榜样。吴应箕《楼山堂集》不论是遭禁之时,还是民族危亡之时,一刻再刻,可见吴应箕的忠义爱国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④

综上所述,从明末清初皖江作家群的规模、创作实绩、在当时文坛所起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不管是与皖江上游的豫章诸子(包括易堂九子),还是与下游的云间派、虞山派和娄东派等派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还要高出一筹。而在学界对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等的研究已较深入的今天,对皖江作家群却还是少有关注,这与皖江作家群所取得的成绩和所应有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希望能引起学界的关注。

(作者通讯地址:章建文 池州 安徽省池州学院中文系 247000)

(责任编辑 晓 宁)

① 方文:《蠡山集》,第850页。

② 施闰章:《施愚山集》(四),第100—102页。

③ 钱澄之:《所知录》,第260页。

④ 章建文:《吴应箕研究》,第106—112页。